

# 乾隆“伊犁将军府”的设立 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回落

——基于西北稀见方志的梳理与分析\*

吕 强

**提要：**乾隆二十四（1759）年后，随着新疆统一，清设“伊犁将军府”，统辖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在此背景影响下，清初曾号称西北“边陲一大商埠”的肃州，此时因军卫职能的下降、军需物资的减少以及边贸经济的锐减而导致城镇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回落。本文就以肃州为个案，分析“伊犁将军府”设立后，作为西北边疆城镇商业经济重镇的肃州，其城镇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反映出清代西北边疆城镇的内地化趋势，即由边城到内城的历史发展轨迹。

**关键词：**肃州 伊犁将军府 经济 回落

清朝作为西北边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明至清初，基于以嘉峪关为界，甘肃边疆城镇的发展在西北表现出蓬勃繁荣的状态，并涌现出一批如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典型的边疆商业城镇，因此，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较为频繁，成果也较多。其代表有张羽新的《肃州贸易考略》（上、中、下）<sup>①</sup>、叶志如的《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下）。<sup>②</sup>但作为清初平定边疆叛乱势力的军镇，肃州城镇商业的发展受军事、政治的影响颇大，发展很不稳定。随着乾隆二十四年，清在“伊犁”设置“伊犁将军府”来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后，清代西北边疆的军政、经济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呈现向西扩大边疆的态势。而在此背景下，作为清初西北边疆军需商业重镇的肃州，其经济发展明显呈现出回落与发展放缓的历史趋势。然而，目前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导致研究成果亦有待拓展。这体现在清伊犁将军府设置后，肃州开始出现由军事化城镇向内地化城市转变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为更好的理解清乾隆后西北边疆城镇内地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提供了学术研究的拓展空间和思考议题。

## 一 伊犁将军府的设立与西北军政、经济格局的转变

明朝建立后，元朝的蒙古皇室北逃至塞外，并继续维系统治，史称“北元”。而“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sup>③</sup>。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西北地方媒介传播西医防疫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CXW016）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中、下），《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期。

② 参见叶志如：《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下），《历史档案》1984年第2、3期。

③ 《明史》卷9《兵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36页。

为防御其侵扰，明朝于洪武五年（1372）在肃州西筑嘉峪关长城<sup>①</sup>，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以辽东、大同、东胜等城镇为主体的严密军事防御体系，肃州因此也被改制为军事性很浓的卫所，称“肃州卫”，成为抵御西北蒙古的“西陲屏蔽”<sup>②</sup>。正如《大明一统志》言：“（肃州）断匈奴之臂，扼西域之卫，土壤肥美……控制羌胡用武之地也，三边沿疆一线通道，东接西遮南蔽北捍，称为孤悬重镇。”<sup>③</sup>清初，新疆出现叛乱势力，一时成为西北边疆统一的最大阻碍，故清袭明制，置肃州卫。自康熙年起，蒙古准噶尔部在西北展开大规模兼并战争，并“渐次内移，住居西套”<sup>④</sup>，势力渐次向青藏、新疆一线扩张，以致距肃州仅十数日程<sup>⑤</sup>的距离，在此期间，青海、西藏与新疆先后被吞并，史称“兼并四部，蚕食邻封”<sup>⑥</sup>。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朝平定复叛的大、小和卓，进而管辖天山南麓诸城，才最终完成新疆的统一。（见表1）可见，明至清乾隆二十三年前，肃州城镇一直为西北边疆的军事要地，其城镇经济也因此受军需的影响而持续发展繁荣。

表1 清统一新疆的历次重大战争

时间	清军将领	清军人数	战争地点	叛乱者	叛军人数
（康熙）1690年	福全、常宁	左右两路大军	乌兰布通 <sup>⑦</sup>	噶尔丹	2万军队
（康熙）1695年	萨布素、费扬古	三路共10万	昭莫多	噶尔丹	杀叛军3000余人
（康熙）1697年	扬古、马恩哈	两路共6000人	未详	噶尔丹	只剩五六百人
（康熙）1718年	允禩	未详	西藏	策妄阿拉布坦	2000人
（雍正）1731年	傅尔丹、岳钟琪	两路5万	光显寺	噶尔丹策零	未详
（乾隆）1755年	班第、永常	两路5万	伊犁	达瓦齐	6000人
（乾隆）1757年	成衮扎布、兆惠	两路7000人	伊犁	阿睦尔撒纳	仅剩8人
（乾隆）1759年	未详	未详	喀什噶尔	大小和卓	未详

资料来源：故宫博物院编：《平定准噶尔方略》，海南出版社，2000年

乾隆二十四年，清军进抵喀什噶尔，全疆底定，清廷鉴于伊犁控制的地域辽阔，内有阿睦尔撒纳的残余势力，外临沙皇俄国扩张的威胁和周边游牧民族的骚扰，随即开始伊犁驻防的筹划。次年初，参赞大臣阿桂就率满洲索伦骁骑500名，绿营兵100名和维吾尔人500名前往伊犁驻防兴屯，并统辖新疆天山南北的军、政事务，此为伊犁驻防之始。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谕曰：“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降压……至伊

① 参见吴人寿：《肃州新志》卷4《营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册，第43页。

② 《明史》卷330《西域二》，第1115页。

③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1《地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15页。

④ 参见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5页。

⑤ 参见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5页。

⑥ 李治亭：《清康乾盛世》卷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⑦ 乌兰布通，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

犁,则必需大兵驻防……其驻防伊犁大臣,即兼理回部事务。”<sup>①</sup>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清廷册封领侍卫内大臣公明瑞任伊犁将军,并饬谕曰“凡迪化、巴里坤所属满洲、索伦、察哈尔之绿营官兵,均皆听伊犁将军调遣,致回部与伊犁相通,自叶尔羌、喀什噶尔以至哈密等处驻扎官兵,亦皆归将军兼管,其地方事务,各处驻扎大臣仍照旧例办理,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回城皆在边陲,如有应调伊犁官兵之处,亦准各处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拨”<sup>②</sup>。至此,伊犁成为当时清朝管辖天山南、北的军政中心,行使中央政府对新疆的主权。

此后,清政府逐渐从内地迁移各族官兵前来伊犁驻防、屯田,初定三年一换,后改派携眷官兵永驻伊犁。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帝谕军机大臣等:

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携眷迁移较为省便,到内地之京口、杭州等处,亦不必多驻官兵,从前汉军人等,原准其出旗拨补绿旗兵缺,此二处兵丁亦应照例裁汰拨补,将所出额缺分例,拣选索伦、察哈尔余丁,派往伊犁驻防,庶粮餉不致虚糜……寻奏:凉州、庄浪旧驻满蒙兵三千二百名,现在无须防守,应遵旨令其携眷移驻伊犁……再将汉军兵缺裁汰,各项额缺给与索伦、察哈尔余丁,往驻伊犁,交该管将军、都统,拣选索伦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作为马甲,照例于应得兵餉外,给与盐菜银两,统计遣往兵丁五千余口,并其眷口,将及二万名,须陆续派遣,议于所拣余丁内,派索伦五百名、察哈尔五百名,于春草萌生时先往,其眷口,着后去五百名携带,凉州、庄浪满蒙兵自明年为始,分为三起,按年起程。从之。<sup>③</sup>

以乾隆时期“伊犁将军府”的设立以及“官兵永驻伊犁”的实施为标志,此时我国西北边疆的范围已向西延伸至中亚,而自明初就形成的以甘肃嘉峪关为界的西北边疆地区,其军事、经济重心也随之西迁至新疆伊犁,此导致西北边疆的军政、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

## 二 新疆边防地位的突起与肃州军卫职能的下降

伊犁将军府的设立,使新疆边防地位迅速突现出来,而军需的激增最能说明这一点。据乾隆末年曾任伊犁将军的永保记载,当时伊犁有“官四百二十员,兵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一名”<sup>④</sup>。而据嘉庆年间所编《西陲总统事略》记载,嘉庆时伊犁有“兵一万七千二百零二名”<sup>⑤</sup>。这与康熙至道光年间编纂的《大清一统志》所记,伊犁驻防满洲兵6574名,锡伯兵1018名,索伦达呼尔兵1018名,察哈尔兵1837名,绿旗兵3098名,厄鲁特上3旗兵1242名,下5旗兵2480名,总计兵17267名<sup>⑥</sup>的数量基本一致。而咸丰年间《伊犁略志》记载伊犁总兵额为17606名<sup>⑦</sup>,是源于道光八年(1828)所增添的300锡伯兵,100索伦兵所致。可见,清统一新疆后,伊犁驻防兵额定制始终为17200名左右。同时,除上述定额驻防兵外,伊犁将军还直辖统领有1000人左右

① 《清实录》卷570《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226页。

② 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3页。

③ 《清实录》卷677《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页。

④ 永保:《总统伊犁事宜》卷5《北路总说》,《伊犁略志》,“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42页。

⑤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2,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⑥ 参见《大清一统志》卷517《伊犁户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26页。

⑦ 参见永保:《总统伊犁事宜》卷5《北路总说》,《伊犁略志》,“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79页。

的绿营兵。

此外，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后，为维护新疆安定和屯田驻兵，还专门颁布了一条上谕，即“被发配至新疆各地屯田的犯人，只要努力生产，那么重犯五年为期，轻犯三年为期，即可释放为民，并将其中的满洲旗人编入八旗兵，允许汉军旗人加入绿营……”<sup>①</sup>。如此“添砖加瓦”的规定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新疆驻军数量自乾隆后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统计，在清中期时，新疆驻军最多时有23000人的官兵。<sup>②</sup>由此推算，自清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后，清廷在新疆平均的常驻军，应不少于2万人。然而，这一推算的数目还仅是清廷在新疆直辖的驻军，与此相应地，当时新疆还存在着大量服从官府差遣的武装屯民，以及效忠清廷的少数民族武装。另据史料记载，1840年之前，清朝在新疆的直辖戍边兵力就已超过十万人规模。<sup>③</sup>派驻超过全国其他省份的强大兵力<sup>④</sup>，一方面表明，清乾隆以后，新疆边防战略地位在清廷统治者眼中显得十分重要，而另一方面也可想而知，由这些戍边官兵所需要的军需耗饷，每年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量。

而有关伊犁的军需耗饷，各史料记载一致。从乾隆后期到咸丰年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即每年需银678900余两，其中扣除伊犁本地收入和官兵领买绸、布、茶、马、羊的价银78900余两以后，伊犁将军府每年还尚需银599900余两，而按照朝廷惯例“宽为备用”的原则，最终清廷每年向“伊犁将军府”调银610000两<sup>⑤</sup>以上。这笔军饷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算是很大的一笔经济支出了。

但与之相对，此时已为腹地的肃州，不论是军卫地位，还是驻兵、军饷等数量都较之“伊犁将军府”设立前已大幅度减少。按《肃州新志》记载，清末时肃州总兵辖的左、中、右三营，其兵力总数为中营马战兵700名，步战兵179名，守兵100名；左营马战兵700名，步战兵179名，守兵100名；右营马战兵700名，步战兵179名，守兵100名，士兵总额为1732名。<sup>⑥</sup>这一兵力与同时期“伊犁将军府”所辖兵力17200名相比，其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当时兵额数的大量减少，必然造成清廷支付给肃州的钱粮军饷减少。若依照乾隆后清政府所规定的军饷标准计算，10000两左右的钱粮已是无战状况下肃州每年所获钱粮军饷的峰值。

另外，乾隆统一新疆后，鉴于西安距新疆距离较远，很难起到统摄新疆的军政作用，故清廷逐渐将陕甘总督驻地由西安移驻兰州，这也是导致肃州地方军卫作用随即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这体现在此时肃州已丧失了明初以来西北边疆军事重镇的地位，进而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内地化城镇。自此，除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曾短暂坐镇肃州指挥军事外，自肃州罢卫改直隶州以来，终清之际，肃州再未在行政上设过军镇。

到民国建立后，肃州更是直接改直隶州为酒泉县，隶属安肃道，领高台县，此时肃州实则已经完全内地化，演变成为甘肃省省内的一个普通二级行政中心。<sup>⑦</sup>正所谓“明又修墩台……未当

① 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② 参见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第116页。

③ 参见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第92页。

④ 清朝对自家“龙兴之地”东北也是重点驻防，但当地的三将军：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其麾下总兵力也不过4万余人（八旗序列）。

⑤ 参见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5《粮饷》，第118页。

⑥ 参见吴人寿：《肃州新志》卷6《军政》，“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53页。

⑦ 参见吴人寿：《肃州新志》卷2《沿革》，“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29页。

不以兵戎为重。本朝开辟新疆，遂为腹地……”<sup>①</sup>；“自兰州渡河至肃州一千五百里，再至嘉峪关七十里名为内地”<sup>②</sup>。这段史料真正从侧面反映出自清乾隆以后，肃州军卫职能下降，并逐步内地化的历史轨迹。

### 三 肃州军需与边贸经济的锐减

作为清初统一新疆的重要军镇据点，肃州在明至清初的战争期内，承担着巨大军需物资的筹备任务，这造成当时肃州城镇的军事经济十分发达。据乾隆初所编纂的《甘省便览》统计，当时肃州共计有兵员是18110名，加上外调之兵，导致肃州在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前，其城镇兵额达到一个峰值，当在2万人以上。<sup>③</sup>而这2万人的军饷物资，据日本学者以清雍正年间对新疆准噶尔作战时所需军费五六千万两为依据的统计，推算出整个清康、雍、乾三朝花费在统一新疆的军费，总数应在1亿两以上，其中尤以乾隆朝的耗费最大，估计占到总军费的40%—50%，即5000万两左右。<sup>④</sup>

而这种军需物质的需要，也刺激了肃州当时朝贡贸易与互市贸易的发展繁荣。据统计：“康熙至乾隆间，肃州共计有携货贸易8次，定期互市4次，交易总额为546607.41两。”<sup>⑤</sup>在这样的军需经济的刺激和推动下，肃州也就确立起了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之前，西北军需商业重心的地位。史料记载，当时肃州受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繁荣的带动，城内建有数量众多且规模较大的仓廩，其中较大的有“肃州大仓、筹边仓、军储仓、军需仓、因丰仓（又名因丰阁）以及军器局”<sup>⑥</sup>等军需设施，共计有十二间库房和几十间大、小房屋。而肃州街市当时更是呈现出“城内街肆宏厂，车马骈阗，胡贾华商云集……五音嘈杂……人物殷盛，洵边地一大都会也”的盛景，全城内有“东大街、大南街、小南街、大北街、小北街、米粮市街、道门街、药王庙街、仓门街”<sup>⑦</sup>等几十条街，还有如“会馆巷、北烧酒巷、南烧酒巷”<sup>⑧</sup>等客观反映商业繁荣发展的小巷。故史书记载当时肃州的军需贸易与城镇商业发展繁荣的状况时写道：“‘市集商贾’为当时肃州八景之一，商旅辐辏，所至如归，列肆陈货阙如五都”<sup>⑨</sup>，称其为西北“边陲一大商业都市”<sup>⑩</sup>。

但如前所述，清乾隆后“伊犁将军府”的设立，使清廷开始将军事重心西移并选择在了新疆伊犁。这使乾隆二十四年以后，肃州兵员总数已下降到千人左右，仅为1732名。受此影响，清廷每年调拨给肃州的军饷因此只有万两以下，这与清初肃州屯兵20000名、各类钱粮军饷1亿两时相比，显然已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此外，乾隆前，清政府为了防止关外蒙古准噶尔部侵扰，清廷还准许外省协饷进入肃州，这也在当时推动并繁荣了肃州城镇经济。但乾隆二十四年后，调拨军饷和外省协饷的大幅度减少，使得肃州社会经济收入急转直下，已大不如前。

①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6《军政》，“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53页。

②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2《沿革》，“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22页。

③ 佚名：《甘省便览》，民族文化宫图书馆，1981年，第33页。

④ 参见〔日〕香坂昌纪，李小林译：《清朝前期对准噶尔作战的经济效果》，《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

⑤ 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71页。

⑥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3《营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43页。

⑦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4《城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46页。

⑧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4《城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49页。

⑨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19《名胜》，“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117页。

⑩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3《营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43页。

与军饷、协饷的大幅度下降相同，在乾隆统一新疆之后，毗邻新疆的中亚诸部为自保，纷纷入觐朝贡并请求与清廷通市贸易，由此导致西北边贸的地点也开始西移，开始逐渐转移至新疆西部各地。史书记载：“（中亚）拉达克闻大兵平定回部，特遣使‘奉书称贺，请通贸易’，以番缎回带为贽。”<sup>①</sup>对此，任叶尔羌办事都统的海明向清廷报奏曰：“据裕拉哩克卡上送巴勒提贸易人等，据称，‘我等系头目默默斯吧尔、乌苏完两处，遣来贸易，我等两部落，向来在叶尔羌贸易，今闻天朝大兵平定回部各城，是以欣悦愿来归附’等语，因呈献两头目书札，臣等加以抚慰，查所携货物无多，以初次前来，免其纳税，并酌给口粮，回人等俱感激叩首，俟贸易事竣，护送出卡。”<sup>②</sup>得知中亚部族请求在新疆进行贸易后，乾隆帝随即下谕曰：“回疆平定，各部回人前来叶尔羌贸易者必多，自可照海明前奏，巴勒提遣人求通贸易之例，准其通商。”<sup>③</sup>

自此以后，中亚各部族与南疆回部的贸易发展迅速，史载“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sup>④</sup>。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仅清廷戍边官兵一次查获的从新疆喀什噶尔和乌什等处，私运的牲畜皮张，就有21200张之多，其中灰鼠皮20000张、水獭海龙皮200余张、香龟貂皮1000余张，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中亚各部与新疆贸易的规模之大。<sup>⑤</sup>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时，这种边贸的规模依然庞大，据清廷专司少数民族事务的理番院档案记载，当时浩罕朝贡者再由京返回到新疆哈密时，其贸易队的规模已达到骑马19匹，其行李、货包，秤重53000余斤，询系沿途添买货物，愈积愈多，计需车88辆<sup>⑥</sup>所致。此后直至道光年间，这样的新疆边贸依然十分活跃和繁荣。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间“当时仅新疆阿克苏一城，凭借其以八城往来之孔道，广袤千有余里，回夷万有余户的地理、交通和人口优势，致使城内时常是商贾辐辏，贸贩鳞集”<sup>⑦</sup>的商业繁茂迹象。

朝贡贸易的繁荣也同样推动了乾隆后伊犁互市贸易的发展。西北定期互市的地点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已开始向西转移，从而进入新疆境内，并出现大批山、陕、苏、浙商人西行新疆贸易的现象。对此，惠等即奏“阿尔赉请于乌隴古将马匹以换货物，清约于明年七月在额林哈毕尔噶、乌鲁木齐等处交易”<sup>⑧</sup>，但乾隆帝却说道：“前虽有禁止伊等彼此贸易之旨，特以回疆新定，不可令哈萨克纷纷往回地行走，故只准在伊犁贸易。”<sup>⑨</sup>随后，乾隆帝又准“请嗣后各分处所，回众与布鲁特、安集霍罕等部贸易；伊犁、雅尔与哈萨克贸易，两得其便”<sup>⑩</sup>。这使得日后众多商人与“哈萨克贸易往来，仅能至新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并将大黄带往新疆，转售与俄罗斯”<sup>⑪</sup>。这些史实表明，清乾隆时在将西北边疆军事重心西移的同时，也将边贸重心

① 《清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未，第794页。

② 《清实录》卷615，乾隆二十五年六月辛丑，第924页。

③ 《清实录》卷615，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壬寅，第924页。

④ 《清实录》卷605，乾隆二十五年正月辛未，第794页。

⑤ 参见《清实录》卷1366，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壬午，第32页。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第297页。

⑦ 清常德奏：《钦定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9《道光六年一月庚寅》，光绪十年（1884）内府本，第686页。

⑧ 《清实录》卷101，雍正十年十一月辛巳，第646—647页。

⑨ 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539页。

⑩ 《清实录》卷96，乾隆二十二年十月（上）丙寅，第981页。

⑪ 傅恒等撰：《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45《正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

西移至新疆。这与清中叶以后，新疆成为西北边疆地区新的“官贸”区域，乌鲁木齐、额林哈毕尔、伊犁等地成为“官贸”中心城镇的史实恰好相呼应。这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清乾隆后我国史料中，很难找到有关肃州日常进行互市贸易的记载，以及乾隆定疆之后肃州边贸始终萧条的原因了。这已成为乾隆设立“伊犁将军府”后，肃州军需与边贸经济锐减的必然趋势，对肃州城镇经济的演变与回落构成不可逆转的历史影响。

#### 四 肃州商埠地位的丧失及城镇经济的回落

军政与边贸经济格局的历史转变，使得西北原有的商贸交通路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而导致肃州不再是“伊犁将军府”设立以前，清廷在西北边境上指定的唯一边贸地点，由此肃州的西北军需商埠地位在逐步丧失。自新疆纳入版图至民国，西北的商业线路也随之向西延伸，即商道与入疆交通线基本契合，形成“（伊犁）→乌鲁木齐→兰州→汉中、重庆→长江”<sup>①</sup>的入疆商道，即从新疆伊犁向东经乌鲁木齐后，途径甘肃全境，再向南经四川或向东经陕西后，最终进入长江流域的贸易交通线。首先是伊犁至乌鲁木齐再至兰州，这一段路线是从新疆伊犁经乌鲁木齐，过新疆门户古城，哈密，到达甘肃安西州（治安西，清属肃州），肃州，甘肃府（今张掖），凉州府（今武威）和兰州府后，分达川、陕的路线，并在此路线的沿途上出现一些新兴商埠城镇，如兰州、凉州、安西州等。对此，史料曾载“从乌鲁木齐东行至古城，其东趋哈密为一略，秦、陇、鄂、豫商人多出焉”<sup>②</sup>；“安西镇城控制东西，为商品聚集之地，东门外尚有客民自盖房屋，在关内拨运货物，开设铺面，现有一百数十家，大街南北，店铺面大小不等，共计九百余间”<sup>③</sup>。

而清乾隆后丧失西北边疆军需商业中心的肃州，此时的商业地位已大不如前，并开始出现逐渐被河西大镇凉州、省城兰州所取代的城镇经济回落趋势。如民国时期出版的《敦煌随笔》在描述清嘉庆朝河西走廊各城镇商业发展情况时写道：“河以西之商贾、凉州为大，往者捷买以资甘、肃，今更远销安西、沙瓜等地，以利塞外。”<sup>④</sup>当时从河西走廊东部的武威到达河西走廊西部的入疆要道安西州的商业交通线上，每日都有往来不绝的商贩，可见该商路上运输的频繁与繁盛。其中在这条商路沿线的高台，商贩们不仅在此歇脚休息，而且还将该县所盛产之大米往来运销到于临近的肃州、安西和敦煌等城，甚至直接入疆贩卖于哈密等地的街头。而位于黄河之滨的省城兰州，至清中、后期后，更是发展成为西北重要商业中心。兰州城内平常城内不仅涌入许多往来进行贸易的外省商贩，而且还在商业繁盛之地建有十余省的商业会馆，兰州乾隆后已成为沟通新疆与内地各省商业的枢纽，而新疆所产物资往往在经过河西走廊后也会直接到达兰州再转运，输往内地各省。在通常情况下，乾隆后由新疆运来的货物经兰州转运大多输往四川、湖广和江浙等地。

商埠地位的逐步丧失和军需、边贸经济的萧条最终导致肃州城镇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回落。首先，清“伊犁将军府”设立后，肃州城市的规模再没有扩大，史载此后也仅有三次城镇的修缮工作<sup>⑤</sup>，城镇形态上基本仍沿用清初时的城镇形态，而城镇规模大小更是基本停留在清初时的十

① 参见黄正林：《近代甘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钟广生：《新疆志稿》卷5《商业》，“新修方志丛刊”边疆志本，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第109页。

③ 钟方：《哈密志》卷21《杂课》，“中国方志丛书”西部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21页。

④ 常钧：《敦煌随笔》卷下《添设关东护墙》，禹贡学会，1937年，第39页。

⑤ 参见吴人寿：《肃州新志》卷4《城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43页。

三里七分左右的。这充分说明“伊犁将军府”设立后，肃州在城镇规模上无所突破，也表明城镇经济发展缓慢，无扩建城镇的需要。

另外，相对于上述乾隆以前肃州军需经济的繁茂，但到清末时，史料中已无法找到反映上述肃州城镇商业经济繁盛景象的文字，反而取代地是肃州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乃至萧条。特别是同治四年后，受西北变乱影响，肃州经济出现严重的萧条局面，呈现出一幅落寞迹象：“昔日豪华之地竟成瓦砾之场……虽大难之后，骤难复原”，而中、外交通中断，时局动乱，又尽毁诸仓，“唯存残阁”<sup>①</sup>。

## 小 结

肃州是我国西北地区较早开发的边城之一，因地处河西走廊入疆通道的西段以及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交汇之处，自古就为“诸夷入贡之要道”，河西保障之襟喉；东西通衢之要冲，军事边防之重镇”<sup>②</sup>。其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一直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孔道，而基于明至清初西北特殊的军政、经济格局的时代背景，当时肃州一时成为当时西北边疆地带的军事、商业中心城镇，其繁荣程度堪称“边陲一大商业都市”。

但自乾隆统一新疆，并设立“伊犁将军府”后，明至清初西北边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格局从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鉴于领土的西扩，清政府为戍边、治边的需要，因此开始大力移兵与开发新疆，使得“伊犁将军府”设立以后，我国西北边疆自此形成了以“新疆”为中心的军需经济和边贸活动，导致大批中亚部族纷纷前往新疆进行边境互市贸易，新疆自此成为西北边疆地区内新的政治和边贸区域，并涌现出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等一些新的边贸中心城镇，这使得肃州边贸重心的历史地位逐步被取代，开始经历由边城演变为内城的城镇内地化转变。因此总起来讲，清代是我国西北边疆城镇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表现在有些边疆城镇应大环境的改变而逐步成长起来，某些城镇则因边城地位的丧失与转化，从而出现城镇经济缓慢回落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也是导致肃州城镇经济在清代发生历史性转变的诸多原因之一。其中成长起来的如新疆的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以及甘肃的兰州、凉州等地，而衰落的则有肃州、嘉峪关等地。

而探究其因，笔者认为，清乾隆后由边城到内城的内地化转变，是导致肃州城镇经济发生回落的诸多因素中的本质原因，并且其回落的历史轨迹一直延续至当代，无论从城镇规模和经济规模而言，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在当代都是欠发达的，这从当今仍有“金张掖（即甘州）、银武威（即凉州）、铜酒泉（即肃州）”之称中即可知晓。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sup>①</sup> 参见吴人寿：《肃州新志》卷4《城郭》，“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15—49页。

<sup>②</sup> 吴人寿：《肃州新志》卷1《地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49册，第15页。